

作家是什么?作家就是讲故事的人,但作家更要努力成为一个真实的生活者和生活中的有心人。就像山泉是从大山深处流出来的,作家的故事也应当从心灵深处涌流出来,那样才有洗涤灵魂的纯度和感动人心的温度。

我出生在古城延安的新市场沟口,这里是延安时期的新建商业街,属于城乡结合地带,号称是延安时期的“王府井”。三四岁时我随母亲和哥哥回到关中老家陕西大荔县安仁镇下鲁坡村。天晴时,站在我家老屋后院那棵老枣树下,望得见南边的华山和东边的黄河水。懵懂时期,回到这个黄河畔上的古老村子,我的根脉之所,用儿童那一双好奇的眼光和心灵开始阅读这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以至元末以来的八辈祖宗繁衍生息之“家巷”,用一个生性调皮好动的男孩的敏锐之心,感知故乡新鲜而神秘的一切,留下许多生动记忆和对于传统农村与农民最初深刻印象……这无疑成为我童年的宝贵经验。三四年的光阴里,不自觉地亲近故乡农村生活的经历,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人生启蒙课。十多年之后,在知青下乡澎湃浪潮中,当我在延安一个并不偏远的名叫川口的村庄插队落户时,并没有感到丝毫的陌生困顿,仿佛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老家。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折,我与农村农民和农业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感情纽带,更像是接通了生命脐带。我像儿子关爱母亲一样,时刻关注着农民的悲欢冷暖、幸福与安康。在五六年间,我同川口村的农民兄弟一道摸爬滚打在一起,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感受了贫穷饥饿困扰也经历过收获与奉献的喜悦自豪。

“羊肚子手巾呀三道蓝,唉呀咱们见面不容易拉话话难!一个在那山上哟一个在沟,咱们拉不上个话儿招一招手,瞭见那个村村哟不见个人,唉呀泪圪蛋抛在沙蒿蒿林……”这首人们熟悉的《泪蛋蛋》,恰巧能够形象地表达我的乡亲乡愁。

如同陕北民歌的真挚纯美苍凉,陕北传统农民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成为我敬重与歌咏的最初的音符和基调。陕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民的勤劳、质朴、诚实、坚定形象,不仅成为我人生的楷模与处世信条,更是我认识判断“新人”,提炼把握文学作品中的新人物形象的某种原则与标识。以后我离开陕西,先后行走于华北、华东、华南和东北大地,视野大为拓展,思考也在深入。祖国广阔的原野上,我几十年漫步感悟体察,审视思索,无论走到哪里,走出多远,心中总是装着渭北高原的下鲁坡村和陕北黄土高原的川口村。只不过经历时间的沉淀与更深刻冷静的理性思考后,它们被置于更加广阔的大背景和坐标系中加以考量,就更加具备了文学书写的值和召唤创作灵感的意义。

当下,我们的国家步入了新的时代。以往小鸟枝头轻歌漫舞的鸣唱,已经无法适应大时代一系列新的变革和伟大斗争的时代要求。人们渴望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企盼全景式气势恢弘的大气之作。

动员起千百万人投身其中的大规模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伟大战役,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朝着“现代乡村”的急剧演变。显而易见,承载农耕文明的农村,开始嬗变为为员快速流动、文化碰撞交融、城乡概念叠加和机会与利益冲突错综交织的新空间地域。这是40年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浪潮冲击的产物,是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现代文明交媾融合的必然结果。从本质的深刻性而言,这比此前任何一次农村变革都要深刻而更具质变乃至颠覆意义。在此其间,旧有的这一切经受着淘汰衰落的选择,而新事物和新人在成长之中。面对如此巨大深刻的社会变迁,作为时代歌手的作家不应该抱残守缺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人们的注意力由聚焦城市再度转移到了对村镇的眷顾。随着十八大以来的一声号角,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如同当年的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下,新的乡村变革浪潮挟带着春天的祥

把握时代脉搏讲好乡村故事

□忽培元

风吉雨从大地原野扑面而来。当人们还来不及冷静端详,就已经身处其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某一个角色。

作为一名立志乡村的歌者,当我面对开始有些陌生的高山大地,感到了焦虑不安。夜深人静时苦思索,深感喜忧参半。面对衣衫不整、表情木讷而内心燃烧渴望改变命运之火的正在失去传统家园的农民和义无反顾地离开土地长年在城市楼宇间讨生活的农民工,面对不少古老村落的消亡衰败现实,面对物质富有起来后精神依然贫穷的广大人群,面对只有老人孩子留守的“空壳村”的凄凉荒寒,面对城镇周遭一片片被屋宇街道蚕食后所剩无几的荒芜农田,面对那些只寻求利用乡土发财而无长远打算的冷漠自私的城里有钱人,面对人在乡村而心仍留在都市的形形色色揣各种梦想的浮浅过客……我们真的良知与公正的天平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和扣问。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某种希望,感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苍凉之中不无希望又隐含挑战的同时,感到了迷雾将散的欣喜。在裂变之中,从传统农民中脱颖而出的与时代同步前进的自强不息者(包括土生土长的优秀村官),有文化、有理想抱负的生气勃勃的知识青年群体(包括大学生村官和驻村第一书记),还有远行归来的企业家和各级下派的扶贫干部,这些不同经历和阅历、不同年龄和身份的人们,构成当下乡村新人的主体。这些关注乡村,立志投身乡村建设、着力推动乡村良性成长的人们,从整体上看,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代表着成长的力量。他们汇集构成了当下乡村复兴最活跃最具积极影响力的能量,承担振兴重任。尽管他们每天都会遇到大量难题而感到焦虑、迷茫和困惑,甚至有人反悔退缩,但是乡村复兴的主体力量毕竟已经形成。处在这样的兴衰博弈、冷热交汇之中,有良知的作家很难无动于衷,在行走乡村的日子里,突然有一天,我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也感到了与某种当下乡村现状的陌生与尴尬。是的,你从前熟悉的农村和农民开始变得陌生起来,你突然发现祖辈依靠种地过日子的农民,他们对于土地和土地上劳作的态度变了,变得冷漠、消极而不可思议。他们的变化不仅仅是衣着与外表,更是内心和精神层面的。

你开始惊异于自己同他们之间有了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透明隔膜,一种就像长大后的儿子与父亲之间无法沟通的深深的“代沟”的存在。不光是语言无法沟通,从他们的眼神里,再也看不到当年那种精神标识,而代之以某种捉摸不定的价值取向和彷徨不安。这是40年间城乡“二元结构”失衡之后的乡村与人群的现状,可谓是蕴含希望又充满挑战。如同秋冬时期的荷塘,文学的藕根正在期待中成长。拙作《乡村第一书记》就在这样的气候环境中酝酿形成。白朗、刘秦岭及周围的人们乃至广大村民群众,就像塘底大大小小的莲藕,开始带着全新的希望,吸收大地的营养,成长并丰满鲜活起来。

这就引发一个问题:什么是新人?当下乡村中谁能代表新人?就像春天到来时,无论风雨寒热,总会有种籽萌发出土。前进中的乡村生活里,新生的事物层出不穷。那些积极地投入,奋力推动新事物成长,努力克己奉公的人们,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新人。新人中有大量年轻人,但新人不一定都是年轻人。《乡村第一书记》中的两位老支书:90岁老支书与60多岁的前任支书姜建国,他们虽然识字不多,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但是作为农村老党员干部,他们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牢固的,为群众谋利益成为他们基本思维定势。因此,他们的价值趋向决定他们总喜欢为新事物鼓掌开道。接受并催生保护新生事物,成为他们的天性本能。当然乡村的裂变正在无穷期地进行,我们的认识和书写当然难免浮浅、远远不够精确,更不够精彩。历史视野下的乡村书写未有穷期。我们的脚力视力脑力和笔力仍在经受挑战考验。



作家进校园 《小岛》热课堂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第十六届名校名师小学语文主题观摩大会在常州市三井实验小学举行。一堂由鲍洁执教的小学五年级课文《小岛》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小岛》作者陆颖墨来到了观摩课现场,与大家分享了《小岛》背后的故事。此次活动是常州市作协“文学点亮生活”的一个片段。根据常州市作协安排,陆颖墨多次走进校园与师生互动。他感慨地说,一次次活动下来虽然感到有

些辛苦,但能跟老师和孩子们在一起心里特别温暖,而大家的提问也让自已获得了新的思考方式。2019年全国启用义务教育统编教材,《小岛》收录其中。这篇反映西沙岛礁部队生活的作品引起孩子们的极大兴趣,许多学生把它改编成课文搬上舞台,不久前举行的青岛市2019年中小学生作文大赛颁奖晚会就上演了情景剧《小岛》,引起较大反响。(李怀中)

《草堂》诗刊举办新时代诗歌座谈会

本报讯 2019年12月2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知名诗人广安行暨《草堂》诗刊新时代诗歌创作座谈”系列活动在四川广安武胜县举行。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梁平、《草堂》执行主编熊焱,以及数十位四川诗人参加活动。

座谈会上,诗人们结合当前诗歌创作态势,就“新时代诗歌”的内涵和外延、诗歌如何介入新时代、诗人在新时代的责任以及诗歌的语言、技巧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大家表示,诗人要积极投身新时代,多创作有温

度、有人间烟火味的作品。新时代诗歌的创作,不能局限于表面、流于标签化,而要真正地反映出整个时代的气象。诗人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要葆有在洞悉历史、把握时代、深入现实中不断磨砺和修炼出来的宏阔的精神境界。新时代的诗歌还需要注意诗意图象,将诗歌的伦理与诗歌的修辞结合起来。

活动期间,诗人们走进武胜红岩英雄文化陈列馆、杨益言旧居、竹丝画帘展馆、沿口古镇、广安区滨江城墙文化带等地采访。(欣闻)

脱贫攻坚关键在于“软件”升级

□任林举

一片旷野,满目疮痍,宛若一个巨大的泥淖。几千年以来,总是有很多不幸的人,被命运之手捉弄而沦陷其中。面对这巨大的泥淖,世世代代的人们穷尽所有的心智、气力和意志,想尽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方式,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在不断做着超越和逃离的努力和挣扎。这泥淖的名字就叫贫困。

为了走出贫困的泥淖,人们怀着急切、厌恶与痛恨的心情,前仆后继,一次次、一年年向“泥淖”的边缘发起冲击和突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从未间断、波及整个人类,且比世界任何一场战争都胶着、艰难、反复无常、难以取胜的征战。

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一样,我们这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东方古国,有史以来从没有停止摆脱贫困的斗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斗争的节奏进一步加快,力度进一步加大。2015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中华民族全面走出贫困的冲锋号角,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

当我们从旁观者的身份转为参与者,开始对这个工程进行深入调查、思考、理解和书写时,才发现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把脱贫攻坚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太肤浅了。在这里,我想就一段时间以来的采访和思考,对历史背景下的扶贫工作和新农村书写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和感想。

一、要在历史和未来的背景下讲好当下的脱贫故事。关于脱贫攻坚的意义,从中央到地方最近两年已经有全面系统的论述,按理说,无论系统性和全面性都已经足够,无需在此赘述。但我觉得,在具体的落实环节,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误差和误区。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扶贫工作人以及一些贫困人群还没有把中央的精神领会透和落实好。有一些做法,有一些工作还只是停留在眼前、表象和表层。作为工作者,我们不是领导,不是上级机关,不是督导人员,不负责指导具体的扶贫工作,但我们要深刻理解脱贫攻坚的本质,要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抓住主流和实质,从历史和未来两个向度上认识到这场战役的深远意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历经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苦难和贫穷中站立起来。新中国建立后,主权和尊严的问题解决了,但贫困人口的问题并没有彻底得到解决;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提出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特殊的歷史阶段。当一部分人早已经富了起来,社会财富已经积累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我们的制度、文化、信念、理念等都有了全面升级的诉求。在这个历史阶段,全体人民不仅要有物质的丰富、生活的富裕,都能过上小康生活,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力、我们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的物质文明相匹配。

消灭绝对贫穷仅仅是一个底线,也仅仅是一个物质标志,我理解的根本目标和最终指向还是要呈现出一个良好的、升级版的社会状态。也就是说,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我们做的每一件事的着眼点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财富的补充和救济,更不是一串漂亮的数字,也不仅仅是老百姓当下的日子,而是着眼于未来整体国民的文明状态和精神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在书写攻坚战时,要把着眼点放高,放远,要依托物质而超越物质,依托当下而超越当下,在充分展示物质成果的同时,将这项工作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社会总体进步的进程中去观照和考量。

二、要在脱贫攻坚的叙事中凸显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信念。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批评有些人“做惯了奴隶,站惯了,不敢坐下来”。进而指出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需要勇气,需要信心,是从人们心理、灵魂里生发出来的力量。有一些贫困人口,因为贫困得时间太久了,便彻底屈服,向贫困低下头,不敢脱贫,不敢致富,甚至不相信自己能走出贫困的泥淖。他们的不相信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不相信自己,二是不相信政府和组织。

对于不自信的人来说,他们的观念、理念、认知和行为方式都已经习惯和形成了地地道道的“贫困模式”或“贫困逻辑”。你给他资金上的扶持,他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把资金消耗掉;你给他扶贫物资,他会按照贫困的逻辑将生产资料变成消费品;你教给他新的技能和生活方式,他们会千方百计回到老路上去。如此一来,就给整体的脱贫攻坚带来了难度和隐患。直接的难度是无论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都难以实现,虽然贫困线被轻易突破,但贫困的状态并没有改变或并没有

彻底改变。当年的资源还没有发挥作用便直接被消耗掉,甚至一年还没到头就已经返贫。举个例子:某贫困户,扶持单位为他买了四只羊,每只价值1000多元,按照贫困标准线,羊一到手,他就已经越过了贫困线,如果按照最初的设计,他好好地把羊养到明年,三只母羊分别产下三只小羊,明年的日子又有了保障。可是,对口帮扶人员离开村子没有一个月,回来一看羊已经没有了两只。调查的结果,那个贫困户觉得自己不会养羊,不可能把几只羊养成一大群,眼看着这几只羊一天天瘦弱下去,很担心羊将来因饿而死,一点儿钱也剩不下,干脆趁着还有肉,抓紧卖掉,卖一点儿钱也算受益了。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但处理起来也有不同的办法;有的会继续买羊把缺的补上;有的转成临时救助的办法,让他的日子维持下去,保证吃饱穿暖。像这种情况,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对口帮扶单位会永远帮下去吗?他们撤离之后又怎么办?就算对口单位可以帮他一辈子,这样的人、这样的心态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于不相信政府和组织的人来说,他们认为,扶贫不过是一阵风,过去之后自己还会独自面对贫穷。他们不相信当地政府会“动真格”将自己从贫困的泥淖中拯救出来。所以,不管帮扶者采取怎样的措施,他们都会暗暗地坚持他们的“临时心态”和“短期行为”。盯住眼前的利益不放手,不但等、靠、要,而且有及时享乐的思想,有东西就用,有钱就花,根本不为明天计划和着想。对于扶贫干部们的热情和用心,表现麻木甚至持质疑态度。表面上是不感恩、不领情、不配合,实际上是不相信。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扶贫工作人工作不到位、长效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因素。

面对种种情况和问题,我们如何把握自己手中的笔?是简单地批判,还是直白地颂扬?我想这是对一个写作者情感、情怀、境界、思考力和能力的重大考验。现在还很难说清如何书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要让自己的笔触及到人的信心和信念。如果没有信心、信念的支撑,多么伟大的构想都将功败垂成。

三、要在脱贫攻坚的叙事中体现人们文化和观念的“升级”。扶贫中物质上的直接帮扶,无疑是最有效、也最有力量的途径,但往往并不是万能的,对于一些个别情况来说,也并非长久之计。全面脱贫攻坚战开始以来,全国各地的扶贫单位和部门也都明确提出“治贫治根”“政策扶贫”“项目扶贫”“机制扶贫”“情感扶贫”等等口号。在实际的工作中,也有许多扶贫干部注意到了文化、观念的重要性,并有针对性地从观念入手进行了正向引导。但一种文化和观念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转变与更新也需要同样漫长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

综合分析各种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他们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也十分复杂。有的是由于大病致贫;有的是由于残疾致贫;有的则因为年老体弱失去劳动能力又老无所养而致贫;有的则因为其他原因致贫,比如资源贫乏或无法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懒惰、安于贫困、不以贫为耻,甚至假冒贫穷以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和社会资源。在攻坚战之前,这些情况并不少见,甚至大行其道,个人千方百计地争取贫困人口的认定,村子里绞尽脑汁争当贫困村,县乡也在不遗余力地争取给自己摘一顶贫困乡、贫困县的帽子戴上。攻坚战之后,解决这些问题也成为一个难点和重点。经过一个时期的制度规范,不良风气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一些人心里的小算盘并没有被消灭。

对于因病、残和资源不足致贫的几种情况,确实需要以物质帮扶和政策帮扶为主,而其他情况的“贫”,根源都在人的观念上,侧重点就应该放在文化、观念的更新、改造和升级上。对于一个即将进入小康社会的人群来说,那些落后的、陈腐的、甚至是有害的观念,必须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予以转变。就如某一台或一些感染了严重“病毒”的电脑,必须下决心予以全面杀毒和升级,否则不但这一台电脑将成为一无用处的废物,而且还会给整个网络带来系统性危害。之于人群,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些与时代、社会发展相悖的落后观念,不仅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危害和伤害,以至于无法真正走出贫困的泥淖,而且也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脱贫攻坚的文学创作中,在把物质工作成果写深写透的同时,也要适当注意精神成果的呈现,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全面反映这场攻坚战的难度、深度和辉煌成就。

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发言摘要

“到人民中去”音乐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市海淀区政协、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中关村街道联合主办的“到人民中去——北京交响乐团走进中国科学院专场音乐会”在海淀剧院举行。艺术家们以一系列经典中外名曲,为来自46家科研院所的近千名科技工作者带来一场文化盛宴。

“到人民中去”精品演出进基层系列活动,是海淀区文旅局充分统筹优质文艺资源打造的公共文化产品“优质送达”供给新模式。自2015年推出以来,活动先后邀请26家专业院团举办各类演出300余场,惠及群众15万人次。主办方表示,今后将继续举办相关活动,以高品质活动推动文化“软实力”成为区域发展的“硬支撑”。(王觅)

《来自远方》将开启中国巡演

本报讯 由聚橙网出品的百老汇现象级音乐剧《来自远方》将开启中国巡演,于今年4月起在北京、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地上演,这将是该剧首次在非英语区国家上演。该剧取材于发生在加拿大纽芬兰甘德小镇上的真实故事。“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历史上首次关闭领空。38架乘载着近7000名旅客和机组人员的飞机,迫降在甘德国际机场。这些“来自远方”的陌生旅客在甘德及周边滞留了5天,各种文化冲突不断涌现,最终人们结下了珍贵的友谊。2011年,该剧剧本兼词曲创作者艾琳·桑科夫和大卫·海因来到甘德小镇采风,心灵深受震撼,最终将这次惊心动魄又温暖动人的事件创作成音乐剧。出品方表示,希望该剧向观众传递善意、乐观与力量。(王觅)

胡可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胡可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2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胡可,原名胡腾驹,满族,中共党员。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剧本《喜相逢》《戎冠秀》《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论文集《习剧笔记》《胡可论剧》,散文集《走过硝烟》等。

于铁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书记处原常务书记于铁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2月12日在沈阳逝世,享年93周岁。

于铁,中共党员。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忆黄色小楼》等,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

马鸣玉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离休干部马鸣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2月19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7岁。

马鸣玉,笔名路桦,中共党员。201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巴山女》《在山泉水清》,作品集《路桦文集》等。

孟和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包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原副主任孟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2月11日在包头逝世,享年65岁。

孟和,蒙古族。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海骝马》《断弦的琴》《鹿斑狼》,报告文学《裂痕》等。曾获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奖、索龙嘎奖等。